

2
1925

三
明
文
史
資
料



njt/51/32

三明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 明 文 史 资 料（第二辑）

编 辑：政协三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三 明 市 印 刷 厂

一 九 八 五 年 二 月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对陈仪主闽的看法和刘建绪与“永安大狱”问题……程星龄（1）	
关于《东南出版社》和“永安大狱”事件的一些情况	
……王一帆（4）	
回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和前往浙东游击队经过……刘 金（13）	
浙东之行与“永安大狱”……周 壁（16）	
宁清归军分区的建立和战斗历程……华东 荣信等（33）	
抗战时期闽西北党组织革命斗争情况……杨 山（36）	
关于三元建县及“忠山事件”回忆……庄炳国（43）	
我所知道的原国民党军八十师和陈明仁将军在福建的	
遭遇……黎一民（45）	
永安解放纪略……赖宝珊（47）	
马芜苓乡公所击匪记……李升宝（53）	
回忆赖德明同志几件事……赖长炳（56）	
回忆几位美国友人……樊品芝（58）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吴明义（60）	
三明化工机械厂史略……许葆立编（68）	
沙县茶叶今昔……张林生（80）	
宋代理学家杨 龟 山……李双柱（82）	

伊秉绶生平及其诗书艺术·····	郭富小 (85)
曹振懋生平事略·····	张宗健 (90)
中国近代航空事业先驱李宝焯·····	李明刚 (93)
三明旧风俗·····	宋经文 (96)
宁化革命文物简介·····	王岳良 (98)
桃源洞新志·····	市政协文史办 (101)
琅口镇与百女坟·····	王成凤 (81)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三明的诗词·····	市政协文史办 (104)
王审知治闽宗旨·····	(105)
“韦斋旧治”·····	王祥堆 (105)
读者·作者·编者·····	(103)
杨龟山诗选·····	(106)
封面设计画·····	郑方伟
封面题字·····	涂大楷
扉页题花·····	陈海儿

我对陈仪主闽的看法和刘建绪与 “永安大狱”问题

湖南省政协主席 程星龄

陈仪主闽七年，就我所知，在政治方面还算比较开明的。

一、他在用人方面比较重视人才，能容纳进步人士，甚至掩护地下党员。例如任用黎烈文、侯宗濂（东北人，记不清是哪省人，委为福建医学院长，全国解放后，侯在陕面任医学院长）、郁达夫等。还有胡允恭（在福建化名胡邦宪，现任南京大学教授），陈通过他的顾问沈铭训（仲九）明知他是中共党员，仍任为县长。被陈仪任用的人，许多并不是国民党员。当时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头子是陈肇英）曾向陈仪指名抗责，陈仪置之不理。1939年我离开福建后，传说陈仪在蒋介石的直接压力下，曾经搞过一次集体入党，限令在职人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荐任职以上干部凡未参加国民党的，由陈仪自己介绍他们加入国民党。

二、通过训练，建立了他的一套人事制度，淘汰了大批衙蠹，起用大批青年学生（主要是县政人员）。

三、尊敬鲁迅先生。陈仪与鲁迅同过学，陈曾对我说过：鲁迅的难能可贵就在于他无情地揭露和彻底反抗现实（指当时的黑暗）；安于现实是没有出息的人。陈曾买过二百部《鲁迅全集》分赠各学校和图书馆。

在经济方面，陈仪采纳省政府徐学禹的建议，企图搞国家资本主义，结果是引起了麻烦，特别所谓“公沽”制度和垄断运输，确是搞

得民怨沸腾。陈仪对海外侨胞，作了完全错误的评价，对侨胞的爱国热忱毫无认识。

陈仪在蒋政府长期居军政要职，持身廉洁，死后无余财。当他在浙江密谋起义，事泄被捕后，他的遗孀是日本人，即陷入生活无着的困境。1949年9月，我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陈的内兄沈铭训（仲九，沈的姐姐是陈的原配）从上海写信给我，要我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反映，希望政府对陈的遗孀加以照顾。我向总理反映后，总理即电上海市政府收买了陈仪在上海的一所住宅（汤恩伯送给陈的），将价款交给陈的遗孀，让她回到日本去了。

1949年，陈仪在浙江密谋起义，事泄被捕后解到上海，经衢州再转台北。1951年或1952年（具体时间记不清）被蒋介石杀害。陈仪在就义前，蒋介石曾派人告诉陈，要陈（1）认罪悔过；（2）在报上发表指责张治中和黄绍雄的公开信。如果办到这两条，可以免其死罪。陈慷慨激昂地答复：第一，我一生做了许多危害人民的事，只有最后一事（指起义）做得对，可以向人民赎罪于万一，对此（指起义），我无罪可认，无过可悔。第二，对张文伯和黄季宽（即张治中和黄绍雄）我只能颂扬不能指斥。陈仪就是这样慷慨就义的。

刘建绪与“永安大狱”

羊枣不是刘建绪诱捕的，程星龄也不是刘建绪交出的。

“永安大狱”完全是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手掀起的。刘建绪对永安大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最初，刘对此是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被第三战区派来逮捕谌震等人的战区参议、军统特务俞某（记不起他的名字）伙同省政府调查室主任易珍（军统特务）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赖文清（中统特务）所挟持，只好唯特务之命是从。

谌震被捕后，刘建绪约杨潮（羊枣）到省政府会客室谈话。杨到达后见俞某在座，情知不妙，将外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借口小便即逃往美国驻永安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先是美新处主任兰德和

另一个美国的工作人员（记不起他的名字）同杨潮私人交谊很好，杨潮被新闻处聘为顾问，他们两人曾对杨表示过：“遇有意外事故，可到美新处来，我们可以保护你。”杨进入美新处后，俞、易、赖等几个特务即再三用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名义，要美新处将杨交出，均被美新处拒绝了。最后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重庆国民党中央，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美驻华大使馆交涉，美大使馆命令美新处将杨潮引渡到第三战区司令部而投入监狱。

当杨潮逃到美新处后，刘建绪曾对我说及：俞某遇过刘约杨谈话时，只是想查问一些情况，主要是查问美新处派人到解放区了解情况的经过，并没有逮捕杨潮的打算。杨一逃走，俞就伙同易、赖等特务分子，非要将杨逮捕不可。事实说明，杨潮、谌震，并不是刘建绪诱捕的，其他的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都是特务直接去逮捕的，也不是刘建绪交给特务的。

在永安大狱发生之前，省政府一些厅处长和委员徐箴、韩涵等（大约有十人左右），多次联名向蒋控告我是潜伏的“异党分子”。永安大狱的发生，矛头更是对着我，我接到好几封恐吓信都置之未理。刘建绪曾取出蒋介石在永安大狱发生前给他的电报并刘的复电。蒋电刘：“秘书长程星龄思想何如？电复。蒋中正手启。”（按“手启”电即是根据蒋的亲笔手令拍发的。）刘复电：“秘书长程星龄思想纯正，工作努力。”刘一面取出密件卷宗给我看，一面对我说：“当时我没有告诉你，是怕引起你的思想波动，背思想包袱。”永安大狱发生后不久，蒋介石电刘建绪：“请程星龄兄来渝面谈。蒋中正手启”。我即于八月十五日搭陈诚的专机（陈诚视察闽、浙、赣边境，经永安回重庆）赴渝。由于陈仪和陈诚的帮助（陈诚有个亲信朱代杰在福建省政府任建设厅长，朱曾向陈诚说明我非共产党员，两是一些不满于我的人诬陷我的，陈也向蒋根力说明我不是什么“异党分子”。）所以我会见蒋介石时，我还未开口，蒋即说：“你的情况我清楚，以后不要同那些思想不纯的人来往。”所谓“面谈”，就只这两三句

关于《东南出版社》和“永安大狱” 事件的一些情况

王一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永安工作前后不到二年，一半时间在监狱，了解情况不多，现又时隔三十多年，记忆不全了。谨就所知谈谈下列一些情况。

一、关于《建设导报》

我到永安是1943年10月，是应谌震之邀去参加《建设导报》工作的。在衡阳由谌震介绍认识了李达仁同志，我和他同车经韶关再转永

话。我向蒋问及我今后的行止，蒋答：“回福建吧！”但没过三、四天，就有特务通知我：总裁（指蒋）面谕，你不能离开重庆。从此我就留在重庆被特务监视。不久，陈仪被任为台湾行政长官去接收台湾，陈向蒋请准，将我带往台湾管教。1945年9月间，我先于陈仪前往台湾（陈向蒋请准后，要我立刻去，怕转务捣乱，中途变卦）。我到达台湾后，1945年11月间，蒋电陈仪：“查程星龄确系异党分子，应即拘捕，电复，蒋中正手启”。（此电系陈仪变由他的顾问沈铭训抄给我看的），陈即将我软禁在长官公署警卫团。1947年1月间，我的老友刘斐和北大同学许孝炎，趁蒋介石打下张家口等地兴高采烈的机会，共同向蒋呈呈，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请求保释。这呈呈是由程潜面交蒋的，蒋即批准释放。1945年，我离开福建省政府，并不是刘建绪将我交出的。相反，刘是想保护我的，但力不从心，能够庇护我而确实庇护了我的是陈仪。

安，时间大约是10月的下旬。我们去的任务是加强《建设导报》工作。我原在桂林一个中学教书，1941年在衡阳《力报》当记者时认识谌震，他到福建当刘建绪的秘书后，几次写信邀我去。1943年9月，他去重庆路经桂林时，又亲自到校找我，介绍了福建政治情况，说可以开展工作。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的。

《建设导报》社长是谌震，后期他很少参加实际工作，总编辑是周佐严同志。我同李达仁同志去后李任主笔，我任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

《建设导报》是一份官方报纸，但由于编辑部掌握在革命同志手上，报纸的基本态度和观点、言论，比较含蓄。但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是它的基本态度。很多消息是从重庆进步同志和《新华日报》方面来的。有时谌震随刘建绪去重庆开会，带回一些《新华日报》及党的书刊材料，对了解当时的时局很有帮助。李达仁除任报社的主笔外，还以大部分精力筹办《东南出版社》。报社除了上述的总编辑周佐严外，还有国内版编辑谢怀丹，助理编辑林子力（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经济专家）。周璧、陈伟顺在《建设导报》当校对，经理是刘作舟。这个报纸是三日刊，四开张，当时在福建发行量较大，大约二万份左右。《建设导报》1943年2月起至1944年2月停刊，停刊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反对进步报纸的政策逼迫下停刊的。因为它多少传达了我们的声音，坚持了进步的抗日政策。总之，《建设导报》办得比《东南日报》好，人民还是欢迎的。

二、关于《东南出版社》

《东南出版社》是1943年10月创办的，为首的创办人是谌震、李达仁等，我也参加筹办，也争取陈东帆参加。最初几本书，就是在陈办的印刷所印的。最先出版的书是由谌震从重庆带回的《天下一家》、《东京归来》等三本书。当时谌震的事业心强，很想干一番工

作。

李达仁是《东南出版社》第一任经理，他原名李品珍，笔名史任远（1938年就任过湖南宁乡县委书记，是位老党员、老同志），是个实干家，很有组织才能及学识。当时，《东南出版社》条件很差，李达仁同志是日夜苦干，大小书亲自抓，从编稿到校对、发行、财务、经济和出版社的建设，都花了很多心血，开创了出版社的局面。在生活上李达仁同志艰苦朴素，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短短十个月时间里，为奠定出版社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1944年下半年，他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

《东南出版社》出的书，郭老（沫若）看了报纸很满意，说书纸、装横、印刷、校对都搞的不错。因此郭老将他的译著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及史论《先秦学说述林》三本书，交李达仁在重庆的老友林一青同志转交东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社把它搞成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郭老看了很高兴。此外还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中国经济论纲》，孙用识的《甲必丹女儿》，张天翼和李达仁写的《贾宝玉的出家》，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作家王面彦的小说二本等。这些书特别是《方生未死之间》，帮助青年对时代的分析和局势的认识起了较大的作用，有很深的影响。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的书，《方生未死之间》还再版三版。《东南出版社》出的书大约共有三十种，每种最少有二千至三千本以上，共出了八万册左右。除行销东南各省外，还分别向重庆、桂林等处发行。

当时出版社人手少、条件又差，能把纸张、设计、排字、印刷搞得这么好确实是不容易的，这充分体现了艰苦创业，效率很高的革命事业精神。

《东南出版社》的第二任经理是李力行同志，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书店经理，未后做了二件事：一是开了个门市部（主任李志国）；二是接受蔡力行的《联合周报》，也出了些好书。蔡力行原是《东南

日报》驻永安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当时，他抓住著名作家王鲁彦肺病严重的机会，写了很多信寄给全国有名的作家，要求大家支持王鲁彦。不少作家寄钱支援并回信蔡力行，他就利用这些信开了个展览会来抬高身价和欺骗读者，并利用和作家的关系，请他们写稿，办了《联合周报》。后来因经济困难办不下去了，便向《东南出版社》提出要求，请出版社接办，条件是将《联合周报》折价入股，他夫妇二人参加出版工作，继续编辑刊物。出版社在永安的负责人李达仁、谌震、李力行等开会研究，并征求了叶康参同志的意见，认为可以将刊物接受过来，加强编辑可以发挥作用，就让他加入进来。1945年7月12日永安大狱事件发生，才知进蔡是有意识打进来的，且抱着很大阴谋，他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可疑的文化特务。羊枣案发生后，羊枣逃到美国新闻处后，他到处寻找羊枣。他参加《东南出版社》是企图从内部破坏东南出版社。他入社不久就自组印刷所，将东南社的印刷业务大半夺了过去。目的达到后，他就退出出版社。

大约1945年2月左右，李力行辞职到黎烈文的《改进出版社》当经理，《东南出版社》董事会开会研究，一再要我去担任经理工作。

我离开永安是1944年3月（建设导报停刊后），那时正好《闽南新报》要请一个总编辑，谌震介绍我去那里工作。《闽南新报》办在漳州，是三青团的投纸。去不去呢？我心里有些顾虑，如果在那里搞得不好，可以发挥点报纸作用，把党的三个坚持坚持下去，搞不好就有危险。几个朋友商量后抱着试试的态度，去了之后如情况不好，便应付两三个月就回来。在《新报》干了一年，情况不允许留下来，出版社又请我回去。

1945年3月回到永安，继李力行担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我任职不久，发现蔡力行搞了很多小动作，背着李力行欠许多债务，李力行没移交清楚，李一走人家就来讨债。不久又发现蔡力行暗中筹办了一个印刷厂，抢拉《东南出版社》的生意，赚了不少钱。我

发现这些问题后，向出版社的董事会提出，蔡就借机跟我闹翻，退出出版社了。

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东南出版社》出的进步书籍，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还有《民主报》的社论等等，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永安在当时的东南各省，形成一个文化中心，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认为东南出版社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我虽然早就和湖南地下党有联系，但还不是党员，东南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党的联络站，我们只是按照各人的能力、关系，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进步文化工作的。

抗战前期，福建文化人的活动，黎烈文在《改进出版社》起了一定作用。他过去坚持进步，参加过左联，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办《改进出版社》出了一些书刊，对东南的文化和革命文艺，对东南读者都有一定影响。但1944年至1945年他的刊物就剩下一个，不敢面对现实，政治上是消沉了。“永安大狱事件”发生后的白色恐怖，他更怕了，连他的经理李力行被捕后的家中困难也漠然不顾。

三、关于羊枣和他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

1944年到1945年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高峰时期。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和《东南出版社》的一些好书，特别是羊枣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在广大读者中反映非常强烈，在东南、甚至在全国都引起极大重视。这时的永安进步言论是很活跃的，东南出版社接编的《联合周报》，《民主报》又经常发表一些有羊枣、王亚南、李达仁、余志宏、赵家欣、叶康参等同志写的很有见解的社论和文章，《民主报》时常刊登老作家董秋芳主编的许多精采的文章。这一些对当时的政治及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因而使永安成为东南文化的中心。

羊枣学识渊博，精力旺盛，文思敏捷，文笔犀利，他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省府参议、美新处特约编辑等职。羊枣对政治军事很有研究，他精通英文，能通过美新处的关系及时译出许多资料。他的

政论和军事评论文章很有水平，预见性强。《国际时事研究》是羊枣主编，李达仁、谢怀丹二人协作，李的翻译水平也不错。《国际时事研究》共出三十九期，直至永安大狱事件发生为止。

羊枣写的文章和评论，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影响，他所分析的情况和战况，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在永安期间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最成熟的时期。刘建绪很赞赏、尊重他，曾为《国际时事研究》题写封面字（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手段）。

四、当时永安上层的几个关键人物

谈到永安当时的上层人物，我认为陈仪、刘建绪在福建期间表现还是较开明的。刘建绪主政福建时，军权给蒋介石搞掉了。刘不是蒋的嫡系，他本质上不是进步的，但从国民党内部比较，他比较开明，和蒋介石有矛盾。刘是个政客，不是政治家，他与国民党内部有矛盾，也与福建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有矛盾。当时福建方面国民党地方势力很大，想与他抗争，陈仪在时压得住福建地方势力；刘到福建，地方势力不把他放在眼里。刘为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上结蒋经国、陈诚、陈仪等，在省内政治上就不那么反动，在他的对手矛盾不激化时，也曾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志，还同意邀请羊枣、王亚南、李品珍、余志宏等一大批进步人士到福建工作，也安排了福建一些革命人士和民主人士，他还启用了国民党左派程星龄。程来福建前，曾于1940年到解放区去过，思想上较倾向共产党，在福建省担任省府秘书长时，帮助了永安革命的进步文化活动。在解放战争中对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较大贡献。政客的本质是个人利害得失第一，所以刘建绪这个政客一到紧要关头，影响到他的个人利益时就什么也不顾了，可以把羊枣、谌震、李达仁、王石林等一大批他邀来的人出卖给顾祝同（顾当时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谌震是通过刘岳厚介绍给刘建绪的（刘岳厚是湖南国民党左派领袖，当时在衡阳办一个报纸，是一份进步报纸，名叫《开明日报》，是我

党领导的)。1942年刘建绪要物色一个私人秘书,那时在桂林工作的邵荃麟(南方局文委在桂林的委员)和林润青同志研究后,通过社会关系请刘岳厚介绍谌震去。谌不是党员,当时只有二十岁多点,聪明能干,能说会写,曾在著名记者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过,并当过《开明日报》总编辑。《开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刘岳厚就将谌震介绍给刘建绪到了永安,他通过刘建绪、程星龄等的关系,请来羊枣、王亚南、李达仁等文化人士。他在创办《建设导报》和李达仁等创办《东南出版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刘建绪任他为私人秘书,对谌震很信任。有些国民党政客官僚想走刘建绪后门或有企求,就想拉谌震的关系,谌就利用机会让这些人拿一些钱来支持办报。谌震还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保护了一些党内同志,如《开明日报》总编辑钟尚文(骆何民同志)被捕后越狱,逃出后找他,谌就通过刘的关系把钟尚文安排到福安县工作。周住严从浙东逃到福建后,谌任他为《建设导报》总编辑。总之,谌震虽不是党员,但为党、为统战工作,作了很多事,出了很多力,对他的这段表现,应实事求是恰当地评价。

五、“永安大狱”事件

1942年在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发生“南委事件”(南方工作委员会事件),南委有个秘书长叛变,好几个省一级党组织被破坏,南方局采取紧急措施,南方几个省停止组织活动。当时永安也可能没有党的组织活动,那时羊枣、李达仁、余志宏等,据后来了解都没有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李达仁(1938年就是刘少奇同志家乡湖南宁乡县委书记)、李力行、毕平非(连城工会主任)这些同志都是党员,但似乎都没有组织关系。当时大家的政治立场都心照不宣,彼此自觉地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政策来开展党的进步文化工作。那时如有党组织来领导,斗争方法就会策略些、灵活些、隐蔽些,可以更好地组织力量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撤

退，而不致象“永安大狱”事件那样，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人被捕，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损失。

永安大狱事件的导火线是周壁（吕宜）的被捕，但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反共政策。我后来知道周壁到浙江游击区去，是当时美新处负责人兰德找谌震，请他介绍一个人到浙江了解新四军解放区情况，谌就介绍周壁见兰德。周拿着美新处的证明出发，沿途写信给永安朋友和谌震，回来时在途中被捕。他经不住国民党的审讯，就乱讲一通。反对刘建绪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抓住这一机会扩大事态，说刘建绪准备在福建搞什么第二次“闽变”。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派了一大批高级特务与地方组成党政军特联办事处，在永安、南平、南安、连城、龙岩、福清等地进行大逮捕，对刘建绪施加压力，结果抓了羊枣等三十余人。

7月12日，我、羊枣和谌震首先被抓。抓谌震、羊枣都是由刘建绪挂电话请他们到省府去。谌震先到被抓了，羊枣到了省府一看情况不好，便机智地把而装一挂，装着要去小便，趁机逃到美新处。我是在12日上午九点多钟被抓。三、四个便衣特务警察包围了《东南出版社》，搜查了三个多钟头，把我带走。他们最初把我关在警察局，我听到警察局长给易珍和刘建绪挂电话：羊枣、李达仁跑了，羊跑到美新处，已把美新处包围了，并说如美新处把羊枣送到长汀坐飞机走，就要在上机前抓住羊枣等等。

8月6日晚特务把羊枣、谌震送走，同时把姚勇来、李达中一同押走。后来知道是送去江西囚禁。1946年1月11日，羊枣被迫害死于杭州狱中。我最初囚在警察局，第二天送到兵营。7月20日左右，又假枪毙，夜送调查室。在这里先后见到了毕平非、叶康参、董秋芳、桂苑兰等同志，也见到姚勇来。大约关到7月底，又把我们一批八人送上吉山保安处囚禁。日本投降后，9月、10月分两批送到永安大监。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4月，永安大狱中12人才被释放。1946年4月我出狱后同爱人余坚到福州，7

月到香港，经香港地下党介绍到广东教书，后上山打游击，参加粤东解放战争。1946年8月，我曾将“永安大狱”事件写了篇回忆叫《练狱》，三万余字，可惜此手稿遗失了。

“永安大狱”事件的发生，周壁只是个导火线，没有周壁也将会以别的形式出现，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定了的。他们也注意永安的进步活动，只是等机会而已，国民党与我党是誓不两立的。“永安大狱”事件不能把责任全归到个别人身上（如周壁），但周作为敌人发动永安事件的导火线是肯定的。周壁被捕后太不小心，丧失警惕，负有一定责任，如及时处理撤退，羊枣和大多数同志可以撤离，不致被捕。在“永安大狱”事件发生的紧要关头，刘建绪不但撒手不管，并参与其事，这就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吴炎谦、林洪通、林春田 整理）

整理者注：1983年9月初，我们访问了湖南长沙程星龄、谌震、广州李达仁等三同志后，到汕头访问了王一帆（王石林）同志，他热情详尽地为我们谈了上面一些情况。10月底王一帆又应永安县党史办邀请，在出访杭州、上海、南京途中，在永安停留二天，看了当年一些活动地方并和党史办同志座谈了当年情况，交换了看法和撰写这一历史专题，他到杭州后又寄来了诗句，抒发他的感触，他的诗如下：

过 永 安

四十两度历山城①，	征尘旧迹恍若新！
夜眺燕江千家火②，	日访吉山百劫身③，
东坡寻踪怀师友④，	南屋忆变步溪滨⑤！
世事沧桑规邈在，	应将史笔励前程。

- 注：（1）1943年10月初到永安，1983年10月下旬重访永安，整整四十年。
（2）燕江对岸在四十年前是一片荒山，只几户人家，现在夜望是千家灯火。
（3）当年吉山四禁羊枣、董秋芳等十多位政治犯的伪保安司令部已不可见。